

尼克遜回憶錄

(中國部分) 尚 辛譯

附：「基辛格」一書有關中國部分





△1971年7月13日，尼克遜歡迎基辛格秘密訪華歸來。兩天後，尼克遜發表了戲劇性的電視講話，透露基辛格曾於7月9至11日和周恩來會談，並帶回周邀請美國總統訪華的音訊。



△1971年10月20日，基辛格第二次訪華，為尼克遜的訪華作安排，在北京機場受到葉劍英和姬鵬飛的接待。



△ 1971年10月26日，基辛格漫遊長城。

這時，聯合國大會正舉行「中國席位」的投票，不知是否巧合，基辛格在北京比預定計劃多逗留二天。

1971年10月26日，基辛格由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陪同遊覽明陵。這是途中在石象前的留影。△





△1972年2月21日，尼克松乘坐的專機“76精神”飛抵北京機場。



历史性握手。



△1972年2月21日，尼克遜抵達北京，當天即獲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。

▽2月23日，第三次會談前，尼克遜幫周恩來說外套。





尼克森夫婦漫遊萬里長城。



在杭州西湖。



尼克遜和周恩來在上海街頭和市民交談。

目 錄

尼克遜回憶錄（中國部分）

歷程曲折的試探期	二
事情開始有了進展	六
一個秘密籌劃中的航程	十一
希辛格初臨中國	十七
長而困難的會議	二一
一項大大的意外	二三
和馬爾勞一席談	二四
抵達北京機場	二六

初晤毛澤東	三
參加第一次會談和宴會	三
和周暢談美國的立場	四
觀看文藝節目	四
使人印象深刻的中國人	五
由毛的一首詩談起	五
與周談論年齡	五
「上海公報」	五
對周恩來的回憶	六
「我們是在建造一座橋梁」	六
附錄	六
美關係突破內幕	六
基辛格對中國的認識	六
審查過時的對華政策	六

探索同中國和解的可能性……

對中蘇邊境衝突的一次討論……

三電駐波大使……

兩個熱心捎信人……

全世界都聽到了乒的一聲……

基辛格偷偷鑽研中國問題……

外交史上最奇妙的遁身術……

周恩來給基辛格的印象……

爆炸性的電視講話……

牽涉的外交問題……

亞洲的力量組合正在起變化……

尼克遜回憶錄（中國部分）

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晚上七時三十分，我在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的電視播映室向全國講話。我只講了三分半鐘，但是，我的話產生了本世紀一項最大的外交意外。

我開始時說：「我請求用今晚的這個電視時間，宣佈我們努力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一大發展。」接着，我便宣讀與北京同時發表的公告：

周恩來總理與尼克遜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·基辛格博士，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舉行了會談。獲悉尼克遜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，邀請尼克遜總統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。尼克遜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。

中美領導人的會談，是要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，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。

在這個簡短的公告背後，雙方曾進行兩年多複雜、巧妙而堅決的外交通訊和談判。雖然，我們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秘密，但主動與中國的接觸實際上有史以來最突出的意外之一。

歷程曲折的試探期

我在一九六七年「外交」季刊發表的文章中，第一次提出美國和共產中國的關係是重要的這個看法。我在就職講話中，曾間接地提到這個看法。當時，我說：「我們謀求一個開放的世界……在這個世界中，任何民族，不論大小，都不會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中。」不夠兩個星期後，即二月一日，我給基辛格寫了一個備忘錄，極力主張，對於政府探討與中國人和解的可能性那種態度，給予一切鼓勵。我補充說：「當然，這件事應該秘密去做，同時，無論如何，不應當在這個方面公開發表文章。」一九六九年期間，中國人不理我們送給他們的少數低層訊號，直至一九七〇年，我們才對打聽對話開始採取認真態度，看看它可能引向何處。

第一個認真接觸中國的公開步驟，是一九七〇年二月採取的。當時，我向國會發表第一個外交政策報告。有關中國部分的開頭說：

中國人是一個偉大而極其重要的民族，不應當繼續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……
我們與共產中國的關係所依據的原則，與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。美國政策看來短期內對中國的態度不會有大影響，更不用說它的意識形態觀點。不過，採取力所能及的步驟，來改善與北京的實際關係，肯定符合我們的利益，也符合亞洲和世界和平與安定的利益。

北京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個報告的措詞的意義。兩天後，在華沙與美國大使沃爾特·斯托塞爾會談期間，中國大使戲劇性地建議，把他們那偶而舉行而毫無結果的會談，移到北京舉行。他並暗示，他們將歡迎一位美國高級官員，擔任代表團團長。

一九七〇年三月，國務院宣佈放寬旅行共產中國的大部分正式限制，四月間，我們宣佈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。

把華沙會談搬到北京的計劃，於五月受到挫折，當時，中國人取消了一次預定舉行的

會談，抗議柬埔寨戰事（編按：指美國進軍柬埔寨）。有幾個星期，與中國的接觸似乎崩潰了。但是，與中國接觸的根本邏輯，是基於對相互利益的明確估計。因此，幾個月後，當中國人示意他們願意恢復我們的外交小步舞時，我並未感到意外。七月間，他們釋放了美籍主教詹姆斯·愛德華·沃爾什，他是一九五八年被捕的，已坐了十二年監。

十月初，我接見了「時代」雜誌記者。我說：「假如我想在死前做什麼事情的話，那就是到中國去。假如我去不成，我想我的孩子們去。」

十月二十五日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·汗來看我。我利用這個機會來建立「葉海亞渠道」。一九六九年七月，在我訪問巴基斯坦見到他的時候，我們已一般地討論了我的想法。現在，我告訴他，我們已決定使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，我並請求他的幫助，做個中間人。

葉海亞說：「當然，我們一定盡力幫忙。不過，你要知道，這是多麼困難。舊敵人不容易成為新朋友。要慢慢來，還要準備挫折。」

第二天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。一九六九年，我在布加勒斯特與他會晤時，也談到中美新關係的需要。我在招待他的宴會中祝酒，成為美國總統有意以它的正式名字——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到共產中國的第一個場合，而我的外交政策報告，還是

把它稱做「共產中國」。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外交訊號。

隔了一天，我在與齊奧塞斯庫會晤時說，即使沒有與中國重建全面外交關係的最後觀念，也可以交換高級的私人代表。他同意把這番話轉告北京。這就是「羅馬尼亞渠道」的開端。

一個月後，即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我給基辛格口授了一個備忘錄¹：

我希望你，高度機密地由你的工作人員做好準備——不要讓可能洩漏的人知道，研究在有關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上，我們應該怎麼辦。就我看來，我們無法掌握阻止其進入的票數的時刻，會來得比我們可能想像的更快。

我們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，是如何形成一個立場，使我們能夠維持對台灣的承諾，而又不致為那些贊成紅色中國進入（聯合國）的人所推翻。

這項研究不必急，不過，在兩三個月內，我希望看到你提出的意見。

事實上，事情的進展比我預料的快得多。